■纪 念

车过老河口

——怀念张光年先生

□高洪波

生活中有诸多巧合与偶然的事，譬如这篇纪念文章。

不久前率队走访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武汉小住一夜即赴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丹江口，车子经过一处叫做“老河口”的镇子，同行的高伟突然说道：“老河口是光年的家乡呀！”于是话题自然转到作协这位老领导的身上。

老河口有一条路以光年的名字命名。当年他从这里走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我、高伟与光年曾同在一个创作联络部党支部，他是中国作协党龄最长的老党员（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在他的家中度过许多有意义的党日，所以老河口唤起我诸多的回忆。

刚刚回到北京，便接到约稿信，明年11月1日是光年同志百岁诞辰，中国作协要出版一本《张光年纪念文集》，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觉得这仿佛是老河口之行的总结，马上动手写下这篇小文。

不久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几家文化单位联合举办了一台气壮山河的晚会，我在舞台上重新领略了《黄河大合唱》的风采：“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两行经典的诗句，一下子把我领入到抗日战场，而光年的激情、才华、使命感，以时代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也借助《黄河大合唱》留在了岁月的丰碑上。

这次走长江，在秭归的屈原祠，我在凭吊屈原之后写了一首小诗：“**诗魂千载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来。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国须捷才。**”“清烈侯”是宋代对屈原的封号，诗中写屈原的命运时，我其实是在潜意识里想到了光年先生的，他是以文章和诗歌救国的榜样，更是捷才。

巧的是我在《张光年文集》第一卷中偶然翻到他1986年10月25日写的一首关于屈原的诗：“**热泪滂沱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屈原纪念馆留字》）。光年凭吊屈原，我们纪念光年，冥冥中竟有那么几分巧合。“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这种口吻是光年典型的口吻，是他以诗人兼造诣精深的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说出的极有分量的话。这是时代造就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说是信仰，也成。

其实早在40年前在云南从军时，我就知道光年，不，应该说知道光未然。因为他1944年整理出一本极有名的云南彝族支系阿细族史诗《阿细的先鸡》，后易名《阿细人的歌》，我在军营里拜读过。我的营房在宜良，与路南相邻，而野营拉练时常住在撒尼人的山寨里，与史诗中讲述的故事背景十分吻合，故而亲切万分，同时为汉族诗人光未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而感动。他和提供诗歌原料的阿细族青年毕荣亮的友谊，也足以让人称颂不已。

真正知道张光年和光未然是一个人，是我1978年夏天从云南部队转业到《文艺报》之后了。光年是《文艺报》老主编，要当好《文艺报》编辑，先熟读过去的《文艺报》，这是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同志对每个新人的要求。永旺是光年的老下级，也是光年十分赏识的年轻人。当永旺以刚复刊的《文艺报》骨干编辑的身份给我们这些新人（包括雷达、李炳银、何孔周、臧小平、李维永……）讲传统时，我才恍然大悟：光未然和张光年原来是同一个人！敢情《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的鲜花》的歌者、《阿细的先鸡》的整理改编者，居然是《文艺报》的老领导，现任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遥远顿时转化为亲近，说亲切也行。

两个身影与名字叠合在一起的光年，引领着百废待兴的文艺界，以诗人的激情与理论家的睿智，加上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启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他或率团出访深圳特区，或带队去大西北采风，更多的是组织评奖，编《人民文学》。那个时候我只是《文艺报》一个年轻编辑，间接听到一些因时代变革造成的观念反差进而产生的文坛纠纷，如批白桦的《苦恋》，就让光年煞费苦心，当然也让具体执笔的唐挚（达成）和唐因吃尽苦头。可是历史从来都是这样递进式发展的，站在当今网络时代的角度看《苦恋》事件，“80后”们会感到莫名惊诧，可当年光年肩上的压力之重之大，也许只有谢永旺同志多少能够感知。

另一件记忆鲜明的事件是河南作家张一弓，他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即将入选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有人反映张一弓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是“三种人”（这是当今需要不少文字说明的一个词汇）。因此中国作协党组和评委会责令《文艺报》火速派人赴河南郑州外调，任务落在我的头上——由于时间紧迫，我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往郑州，机舱里像个大卡车的车厢，客人靠四边坐定，每人还发了一床军用毛毯，这时我的感觉是即将跳伞的空降兵，而不是“外调”人员。

在郑州先见到省文联领导人、老作家于黑丁，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对张一弓人品与作品的首肯，继而又到《河南日报》（张一弓的工作单位）开到相关的证明材料，我行色匆匆从郑州飞抵北京，从机场直奔评委会所在地京西宾馆，我记得光年、冯牧一干作协领导人面容严峻而又急迫地听取了我的外调汇报，马上召开了评委会，《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成为那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一个亮点，后来还拍成了电影。作者张一弓也开始了自己扬眉吐气的文学生涯，这一切如果不是光年同志的果断处置、大胆决策与慎重考虑，社会效果决不会如此良好，通过这件事也让身处其间的我感受到一个作家所能体会到的组织的温暖，还有无数长辈殷切热烈的目光……

作为一名远观者的我，正是因为光年倡导举办文讲所七期的评论编辑班才成为鲁院学员的。他对文学期刊评论与编辑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文坛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与此同时他为当时的作协所属期刊制订工作条例（即不严格坐班，要有读书、调研和写作的时间），造就了那个时期诸多的复合型人才。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光年建议：一年中12个月，编辑们可以一个月读书，两个月调研出差，9个月工作。后被简称“129制度”。《文艺报》当时的同仁们应是最大的受惠者。

事实上我与光年的接触一直不多，远不如与冯牧、达成、罗荪甚至文井、葛洛、朱子奇，还有舒群、管桦等前辈那么密切，但1985年底我突然受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的一项任务：撰写该书系“中国文学”卷“张光年”词条，不到两千字的条目，在谢永旺同志的指点下，也在光年亲自过问下，勉强完成了这项工作。其间我曾登门向光年求教过，也聆听了他的醇厚湖北口音基础上的普通话，讲话慢条斯理、思路十分清晰的光年，讲述着自己经历过的风雨人生，讲述着遥远的云南，讲述着抗战的烽火和写作《黄河大合唱》的背景，你会感到充满钦佩景仰，你会仰视，你会为自己的年轻而惭愧，会产生一种愿意去追随、去寻觅、去冲锋陷阵的冲动——也许这是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吧。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长者、仁者和智者光年，也是老河口归来急于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因。

百岁张光年，黄河的歌者，长江的儿子，因诗歌而不朽的大写的一个人。

■生活质感

静的狰狞

□郑彦英

我母亲的坐功是一般人无法比的。我小的时候，见到母亲最多的状态就是盘着腿坐着做活，而且大都在我家的土坑上，扎花绣朵，裁剪缝补，而更多的是纺织。我童年的催眠曲，大都是母亲摇动纺车的纺线声。所以，母亲到了老年，腰板依然很直，走路也很快，她住在五楼，每每和我一起上楼，她上楼的速度还比我快。小区的老人大都很羡慕母亲的健康，特别是她笔直的腰板，问我母亲是啥原因，母亲想了很久说，可能是盘腿坐着做活的原因，大家就问她怎么盘腿，她只好现场示范，老人们这才知道，她盘的是最难盘的一种：双盘。以双盘姿势坐着做活，腰自然是直的，一辈子都这样坐着，自然养好了颈椎腰椎。

每年一过小满，我母亲精神就特别好，这种旺盛的精力一直会持续到霜降。去年过了芒种，她下楼到报箱拿报纸，她性子急，离报箱还有三级台阶，她就伸手去拿了，却没有注意脚下，一下子迈过了三级台阶，整个身子被猛然蹴了一下，她立即觉得腰疼，赶紧坐在了台阶上，并用手机给我弟弟打了电话，我弟弟从五楼飞奔下来的时候，她说没啥事，你扶着我到院子转转就好了。弟弟听话，扶着她走了两圈，她依然觉得腰部疼痛难忍，这才给我打了电话。

我立即开车过去，拉着母亲到了省人民医院，医院给母亲拍了片子，断定为腰部两截椎骨压缩性骨折，建议住院。

我却没有让母亲在人民医院住院，我立即趋车到了洛阳正骨医院，几个专家都和我是好朋友，他们看了片子后，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仰躺70天，骨头自然会恢复到以前位置，但是绝不能下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翻身。第二种就是在两截被压缩的脊椎处，微创注入骨水泥，在病床上静卧一到两天就可以下床。我问哪一种好些，专家朋友说各有利弊。第一种虽然不用做手术，但是人要在床上仰躺70天，是很难受的。第二种虽然好得快，但骨水泥毕竟不是自己生长的骨头，而且骨水泥结实，老人的骨头已经疏松，再遇跌摔，结合处容易断开。

我说：“骨水泥再好，也没有我母亲自己长起来的骨头好。”母亲说：“对着呢。”

但我们没有想到，真正躺下来，劳动了一辈子的她根本不能适应，生活也遇到一系列问题，好在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轮流侍候，让母亲在床上安卧了70天。

母亲日夜盼着下床那一天，终于盼到了，但是真正下床时，母亲的两条腿却站立不住，好在我的朋友、骨科大夫王世伟已经给我预警，并且在母亲下床时，他现场指导，让我们扶着母亲走了几步后，就让母亲再回到床上躺着。母亲问王大夫：我的腿又没受伤，咋就不能走呢？王大夫说：人是动物，不但是腿，身上的所有器官，都是在动的状态下活跃着，静下来这么长时间，它们就渐渐退化了，要慢慢恢复，要有心劲。

母亲说：“有这一群儿孙，能没心劲吗！”从此，母亲每天坚持练习，大概过了一个月，母亲已经能扶着楼梯下楼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母亲上下楼梯和走路已经没有什么问题，腰也不疼了，但是母亲自己感到身体大不如受伤以前。那一天我陪母亲散步，母亲说：“眼看都芒种了，我身上的劲儿咋还没来呢？天都热了，我还不敢脱衬裤，那天试着脱了一会儿，清鼻涕就下来了。还有头，稍一累，就发蒙。”

这给我震动很大，往年到了这时候，母亲已经铺凉席了，现在却连衬裤都不敢脱！

“我看这身子给躺瞎了。”母亲说：“人活的就是个精气神，这一躺，就剩下个空壳身子，连四季都接不住了，还活个啥劲儿呢？”

在那些饥饿的年月，母亲日渐消瘦，也没有如此悲哀过，如今儿女大都有了成就，母亲却对日子如此气馁，我就很心酸，只能给母亲不断地说似乎走两步就能抓到的希望，能让身体恢复到一年前的状态。母亲开始相信，后来不信了，说，我看这人，也不能活太大年纪。

这话吓了我一跳，我说，现在的百岁老人海啦，你才81岁，我还要在你99那年给你过百岁生日呢！

母亲笑笑，没有吭声。

我就给王大夫打电话，问他，母亲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王大夫说，只要每天坚持锻炼，再有一年，能恢复。

母亲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说：“这是给我鼓劲儿呢。咋可能跟去年一样呢，日头已经到西边了，一动弹，只能往下挪吗。”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母亲每天上午坚持在小区花园散步一千步，下午再走一千步。昨天下午，我陪母亲一起走，走到一千步的时候，母亲额头上已经汗津津的了，我们就坐到花园的石凳上歇脚。

我叹口气说：“要是去年给你打骨水泥，可能不会伤着身上的气力。”

母亲说：“人没有前后眼嘛。”想想又说：“乡里干活的马，一辈子都动着，连睡觉都是立着，只要卧下来，离死就不远了。”说着站了起来，“回家，我给你做菜面吃。”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让母亲做菜面了，害怕累着她，但是今天我没有拦她，我对母亲说：“走，你做面，我砸蒜。”

■印 象

老宅里的庄市

□鲁 敏

各地的城市，要比新鲜、比富丽、比阔气，那真是永远都比不完的，这里有五星饭店，那里有超五星，这里有八车道，那里有双向十二车道，这里有高铁，那里有机场，这里有市民广场，那里有城市客厅，总之到最后全是了不起的高大展馆、玻璃幕墙、音乐喷泉、花坛与雕塑以及装装样子的露天咖啡座（那越来越糟糕的空气，谁还能坐在露天里啊）……这其实跟一个人是一样的，有钱未必要镶几颗金牙，有才未必就要戴副眼镜并拿两支钢笔插在口袋里。一片地域，一方水土，其真正的根基与底气，并不在门面上，反而是在弯弯绕绕、青苔丛生的小巷深处，在老街与年深日久的旧宅里。

譬如宁波，要到她的市中心去，楼宇煌煌、华光灼灼、流金淌银、人车拥堵，似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往下面走走，往边上走走，往深处走走，到了镇海，到了庄市，异处才慢慢显现出来。

庄市是个小地方，早先就是一处临海的小镇，就算到现在，户籍人口也就两三万，方圆不过25平方公里，可是，仔细一看，不得了，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所谓“无宁不成市”的“宁波帮”，就是发源于庄市：首建电厂水厂的宋炜臣、为国人带来火柴、美孚灯、食品罐头、船舶制造的五金大王叶澄衷、世界船王包玉刚和董浩云、影视巨子邵逸夫、建筑泰斗叶庚年、荣华纺织创始人赵安中……这些商业奇才都是从这个小镇一步步走向全球的。但是与晋商、徽商大有不同，庄市的儿女都有拳拳赤子之心，发达之后，竞相反哺乡里，立志公益，先后捐建有崇正书院、叶氏义庄、“江南第一学堂”中兴学校、私立韧初国民学校、同义医院、菱漕小学、宁波大学等，祖荫浓厚、墨香流传，小小庄市而今竟“出产”了六位两院院士……这样的渊源与传统，成为庄市老屋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走进叶氏义庄、中兴小学、包玉刚故居、庄熙英旧宅、大夫第、沈家大屋、叶家小洋房、龙头老屋等处，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端正不俗、简洁实用，精致而绝不奢靡。尤为可贵的是，这些老屋都保存得当，物以致用，以一种从容安详的姿态在现代都市中与光阴一起呼吸。要知道，在许多的古城，为着所谓快速发展之需，对老街旧宅大肆拆迁重建、在保护的名义下毁坏、修旧不如旧的商业包装等等，已成为令人心痛的一大怪圈，以此观照庄市老屋，更是令人感慨。

我们随便走进一家老房子。这处庄熙英旧宅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两间两弄两层，占地500多平方米，其屋主人曾在沪上创建华中银行、上海银行，后在上海任行政官员……进得庄宅，两位一口宁波方言的老人家正坐在正屋的廊下逗弄笼中鹦鹉，这个长而宽大的旧屋廊，跟《镇海文物大观》上的图片几乎一模一样，可见保存之完好，也足见当初工艺与材质的精当。笼中鹦鹉活泼地跳动，为表欢迎，老奶奶上前，以宁波话逗弄，鹦鹉果然清晰地开口：“你好你好”，接着它又以宁波方言叫唤一个小孩的乳名……主人引我们进堂屋，只见长条桌、清供、条屏、太师椅、圆桌等居家物品一应俱全，虽然古旧，但自有光泽，墙上还插着拂尘与鹅毛扇，散发着大户静宅的气息。堂屋中悬有一匾为“积善堂”，几步之外的院子门头上另刻着“积善迎祥”四字，足见屋主人宅厚仁心的旨趣所在。而今的后人也是一样，两位老者必已多次接待访客，但热情之态依然自如，浅笑着耐心回答众人南腔北调的各式问题。

前院子里，有旧时用来防火的储水大缸两只，另有大小石权十来只，随意置于墙根，因年日深久，上面的花纹已被蚀平，或许是祖上用来作为盐粮出入的计量工具，或者是某辈里曾有几个习武的兄弟在晨间用来练功，光是这些石权，简直就可以写上几部短篇小说……最可喜的是几缸荷花，缸器或是长方或是椭圆，材质有瓷有石或是瓦，皆是浮萍密密，荷叶带珠，衬着墙上的小青砖与地缝间自在生长的野蔓，朴趣天成，一种江南宅第特有的温润清雅之气，纯正得简直令人伤感……

另一拨人却在厨房里啧然惊叹不已。庄屋的厨房十分宽敞，约摸有五六十平方，“新旧”两套体系并存，旧的这边，大的风箱土法灶台，很讲究地镶有一圈木边，中间安放着三口大锅，半空吊装着木质架子，收拾得十分洁净。老人说，到过年时蒸包子做年糕，还是要用的；但平常饮食所用，则是旁边这一套完全现代派的蓝色整体橱柜。不过，这两者并置于一屋，毫不冲突，反而像老祖宗带着小孩子似的，自有谐趣，也可能因为新式灶与老式灶之间有个过渡：倚墙而建的架子上，自上而下，整整齐齐放着各式餐具与器皿，十几只造型各异的水壶、五六只大小不同的铝锅、七八只颜色热闹的热水瓶，最下边则是剥好了的两箩筐蚕豆，大约就是晚上用来做菜的……这种家常的富足与烟火气，实在可爱极了。老人家步子迟缓地扶着家具走进来，表情平静地对着相机的镜头，她的眼神比最先进的尼康镜头要深远得多，那里面，有着整个庄市的历史——这间老屋，以及庄市的许多老屋，在极速变幻的世道面前，正以宁静的方式守护并延续着民间的雅正与朴素。

山村晨曦 刘淦清 作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69期

原上草

夏日的河流

□王彦山

一条大河将一座城市劈成两半
一半用于祭奠，一半用来挥霍
这是我居住的城市，美丽而肮脏
我看着一个少女鱼一样穿过桥头
一半用于孤独，一半用于眺望
一艘采砂船死死焊住河面，平静而开阔
它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向天空
没有白帆，在水鸟的眼睛里凝固成
白色巧克力，水牛低头反刍
上游的一缕炊烟，顺着山谷
一直爬到山鹰的黑色翅膀上

衔山远去，一条大河在一头水牛
温厚的舌头下翻卷着流向远方
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开阔
一个默片时代的序幕：大水在逼近
我在甲板上给你写信，看着一条大河
膨胀得像一段汁液充盈的水草
我就是那船长，仰面朝上，咀嚼着
这水草般的河流，你的黑发垂下如黑夜
覆盖我的胸膛，我在你的黑发里
点亮一盏渔灯，我就是那不可一世的船长
在漫天星光下，染上浩浩荡荡的乡愁

■土地与行走

苗家五彩衣

□王剑冰

车子一路上坡下坡下坡又上坡，已经隐隐看到对面的寨子，走一个小时还是没到。县里的董部长就说了一个苗族民谣：看到寨子，走倒骡子，听到狗咬，走破鞋子。莫得急哟。车子爬一个弯坡大喘着再也爬不上去，当地早有人迎候在那里，喊着将车子推上坡。没多一会，又在一个坡上卡住，越使劲越打滑，还是被人推了上去。我们坐在车上，心里又暖和又不自在。想下去一块推，司机说还要压车的，轻了更打滑。耆街这个苗寨，莫不是居在了云彩尖上。

第一次知道耆街的“耆”代表长寿的意思。土皮苗寨不知道多少年了，大山间选一块能够群居建房并且垦植的地方多么不易。而祖上最早的聚居地，是中原的黄河边。苗人都知道先祖蚩尤，是和皇帝炎帝同时存在的三大部落首领，后来炎黄族群打败了蚩尤部落，苗人渡河南迁，为了寻找长久的安身地，又越过了长江。苗人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只有迁徙和躲避，一直躲到没有谁再愿意理的地方。一旦触碰到了哪根神经，就又会遭受一次打击。一个外国学者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到了汉代又有一次大规模打击苗人的行动，使得稳定多少年的苗人被迫再次向西向南迁徙，唐代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高山重叠江河漫障的云南。昌宁苗族在清末又因为红白旗事件从文山迁往滇西，光绪年间进入昌宁一带停下来。而后人们问到这个地名，有人记得一个坡字，写出来却叫成了土皮。土皮的名字也有意味，山上的植被浅，就是利用那层土皮经营着庄稼和生活。路上看到有人在烧荒，想让更多的土皮露出来种地，但是不允许的，现在的理念是多长树。

高山上的生活是一种无奈，却还是要唱歌，还是要织彩衣。有时会站在山上茫茫北望曾经的家乡。他们至今说着的“朵泪郎”，就是黄河边的意思。

终于听到了歌声，是欢迎我们的，偏远和崎岖的山路，很少有外人来到土皮寨子，不是在县里看到出自这里的苗家服饰和专意安排，我们也到不了。现在真正看到那些穿在他们身上的神物了，都是经过数年的手工制作。土皮苗家服饰惊羡了世界，针针线线缝制的五彩服，不仅有苗家女子的技艺，更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苗家的迁徙史、生活史，有着他们的崇拜和追求，他们的喜好和情爱。

为了不忘别离的故土，每走过一个地方，苗人就在女子服饰上做记号。衣服上的每一缕红，都是苗家经历的一次血战。彩色线条，是迁徙中越过的一条条河、一道道山路，起伏的波纹和穗子，代表着故土肥沃的田地和秀美的村庄，尽管再没有到过中原，但故乡情结始终缠绕在心头。她们指给我最显著的布块，黄色代表黄河，白色代表长江，绿色代表生存的澜沧江。而三角小围腰，那是祖先曾经的旗帜。

苗家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用服饰记录自身的历史，穿戴着不丢不弃。五彩服是苗族五千年的无字史诗。这说明昌宁苗家经历了太多的困苦，经历得刻骨铭心。中原的一些生活方式，甚至一些方言也保留下来。有人带着家谱，带得久了，已经残破不堪，但还是代代相传。

歌声又起，彩裙舞动。每一条彩裙都不一样，花色的搭配、珠穗的缝缀都有特点，展示着苗家女子的聪慧。女孩从十五六岁甚至更早开始缝制自己的新衣，一直到出嫁才算完成。可以说，她们把自己全部情感都缝缀在这件彩衣上。一套苗女盛装由18件组成，被人说成十八一枝花。除作为嫁衣和重大节日穿，死后还要做老衣。裙摆飘起，能看到里面统一的白色百褶内衬，摘下帽子会看到白色毛巾包头，依然是中原人包头的方式。

做衣服须要先种麻，而后经过切、绩、煮、漂、纺，最后牵线织衣。来的路上看到了葱绿的麻林，那是专门经过上面许可种植的大麻，只有大麻才能做出传统的服饰，山寨的服饰奇迹般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的织机同中原没有什么差别。刚才在一户人家就见到笨重的织机还在一个女子手上铿锵有声，一缕缕的麻线变成彩色的布幔。

现在他们开始对歌了。苗家是喜爱山歌的民族，“男不吹笙难结伴，女不唱歌无知音”。生活在大山深处，歌声使他们排解，给他们带来向往和快乐、友情和幸福。

第一次听到这种对歌，比刘三姐的对歌还婉转，是那种一曲十八弯的婉转。调门忽高忽低，音量忽大忽小，大的时候撞到山上返回来又撞上去，小的时候一点点的像沉入了草丛哪片叶子而后又悠悠飞起来。有时像说话，不紧不慢字字硬实，或快人快语成连珠炮。怎么都是好嗓子，不管丑的俊的高的矮的，声音出来都是那么水亮，光听声音，不定就迷倒了谁。没有人为他们谱曲，完全是祖辈相传，竟然传得如此艺术。

山对山来岩对岩哎，
蜜蜂采花顺山来哟。
蜂蜜好吃花难采哎，
这方好玩路难来哟……

屋子在她们身后的山上散落着，墙是干打垒做成，瓦在上面承受着风雨。桃花在房前粉红，梨花在屋后妍白，鸡在门前觅食，狗随着人跑来跑去。一切都是生活的本原状态。让你觉得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是一种自在，闲着的时候冲着大山一声亮嗓，山那边就会响起一连串亮嗓，说不定还会将哪一个人的脆音喊过来，一呼一应地就有了一种意思。

山路遥遥，他们中很少有人走出过这座大山，女子中长得最好的阿娇也只是去过保山，因为考上了保山的学校，而后回来教育她们的后代。更多的女孩在这里出生，长大，嫁人，然后再生出像自己一样的女孩。

我盯着她们的帽子，那帽子有点像帝王的华盖，圆圆的垂着玉穗。是的，她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帝王，她们拥有无限江山、无限快乐和满足。

雨飘过来，山越来越绿了，山上走着白云，一些声音裹进了云层。